

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遭遇劳动争议,有的女职工考虑到维权时间长,身体吃不消,想要放弃——

“女工不要怕,权益争议找我们”

阅 读 提 示

自2016年9月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女职工权益争议审理庭成立以来,累计审理女职工权益争议案件4909件,总计支持女职工工资、产假工资、生育津贴、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赔偿金)等各项诉求50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赵昂

在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有一个全部由女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这也是北京市劳动仲裁系统首个专门处理女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的劳动争议的仲裁审理庭。

自2016年9月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女职工权益争议审理庭成立以来,该庭通过一系列机制创新,在缩短案件审限、提升案件调解率、加强对特殊人群劳动权利保护、维护辖区劳动关系和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5年来,她们累计审理女职工权益争议案件4909件,总计支持女职工工资、产假工资、生育津贴、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赔偿金)等各项诉求5000余万元。

抱着孩子来仲裁

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杨学旺,还记得女工庭成立之前,女职工权益争议类案件呈上升态势,“2015年全区立案3865件,申请人为女职工的有1512件,占比39.12%,到2016年,全区立案3864件,立案数变化不大,但申请人为女职工的增加到1764人,占比45.65%。”上述情况并非东城孤例,北京市在2016年前三季度,仲裁立案61996件,申请人为女职工的有24739件,占比39.9%。

有相当一部分女职工是在孕期、产期、哺乳期这“三期”遇到权益争议。入职策划经理的高女士与公司签订了5年合同,数月后,她把怀孕情况告诉公司,却被多次谈话要求停薪留职或主动辞职,拒绝后被企业以“不能胜任”为由解除劳动关系。企业认为她“不合

格”的依据是两个策划案存在“排版不美观”“字体不统一”等问题,客户未选择其方案而选择了其他同事的。

事实上,随着生育政策变化,涉及“三期”女职工权益争议的案件越来越多。在2014年东城仲裁院成立之初,杨学旺院长就想成立女工庭,但当时人手紧张场地有限,仲裁员年均办案高达400件,这件事不得不搁置。而后,随着新仲裁员逐步走上审理岗位,2016年9月,女工庭成立了。

单身母亲李女士,是带着幼儿来参加庭审的,公司未支付她在“二胎”产假期间工资和生育津贴,庭审时间较长,女工庭派出专人在接待室照顾幼儿,“有的申请人挺着大肚子,有的抱着还需要哺乳的孩子,有的产后情绪不稳定,一直在哭。”女工庭庭长周思思说,对于即将生育或生育不久的女职工来说,走到仲裁这一步,其身体上、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都会告知申请人,如果需要休息就举手示意,如果需要哺乳就提供方便。”

快立、快审、快结

组成女工庭的5名女仲裁员,平均年龄33岁,其中有4名是研究生毕业,全部通过司法考试,法律业务水平高。仲裁员在工作中发现,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餐饮、旅游、健身、设计、电影院、教育培训等行业的女性申请人有较为明显的增加,这些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女职工也较为集中。

担任市政主任设计师的刘女士,月薪3.5万元,去年5月怀孕后,公司8月以其所在部门撤销为由将其岗位调整至文员,月工资降至5000元。但实际上,公司并未撤销市政设

计师岗位,刘女士签订《岗位调动确认书》后依然从事市政设计师工作。

在周思思看来,部分女职工在维权意识弱的同时,也面临维权成本高的困境。有的女职工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但法律知识欠缺不知道如何维权,也有女职工虽然知道如何维权,但迫于就业和生活压力不得不放弃。“有的女职工考虑到维权时间长,自己怀孕哺乳,身体吃不消,不得不放弃。”仲裁员张琪说。甚至,有的女职工明明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但还是和企业就离职签订文书,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女职工说,企业说不签字就不给最后一个月工资。我告诉她们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不要怕,权益争议找我们,我们帮你把工资要回来!”周思思说。

针对这些情况,东城仲裁院在机制上做了很多有益创新。杨学旺院长告诉记者,考虑到“三期”女职工权益争议的解决,较普通劳动争议更具紧迫性,仲裁院为女工庭设置专庭,保证只要有案件就可以安排开庭。该院还设置“绿色通道”,为“三期”女职工开通了快速立案窗口,由专人值守,符合受理条件的,在接收立案材料当天完成立案审批,按照优先排庭、优先调解、优先审理、优先结案的“四优先”原则,形成了“快立、快审、快结”。仲裁院还与区司法局沟通联动,为“三期”女工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降低了受理条件,并指派专门的援助律师。

其实,走到仲裁这一步,职工与企业都希望以和谐方式解决争议。职工希望尽快拿到补偿,企业也希望调解解决,“因为法院判决书上网,一旦打官司到法院,企业如果败诉,对形象有影响。”周思思说,另一个原因是成本,企业请律师应对诉讼,成本远高于仲裁调解。

做到“一碗水端平”

在调解过程中,女仲裁员的优势发挥出来了,她们温柔细心亲和力强,稳定双方情绪,更好地化解争议,另外,通过相同性别、相近年龄、相似经历的“同理心原理”,可以更加

顺畅地与当事人沟通交流,减少女工在维权过程中的畏惧和顾虑。

高女士是高龄产妇,家住距离东城仲裁院50公里之外的通州区西集镇,丈夫又在外地工作。女工庭工作人员到家中现场送达文书。后来,她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申请请求”得到了支持,企业未提交招聘广告中对高某职位的描述及要求,她能否胜任工作不能仅凭两个项目策划方案判断。

“在庭上,我们是秉持公平公正的仲裁员,在庭前庭后,我们可以用女性优势,体谅女职工的难处,急她们之所急,想她们之所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降低她们维权的成本和难度。”张琪说,她们实行调解程序前置,仲裁员为每起争议都事先设计调解线路图,在庭前前、中、后的每个环节均不忽视调解,力争促成双方达成一致。刘女士的领导一开始拒绝调解,态度恶劣,庭审结束后,仲裁员再次与公司协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公司同意调解并当庭支付全部款项,双方握手言和,刘女士返回原岗位继续工作。

当然,并不是女职工所有的申请都会满足,李女士要求支付生育津贴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得到支持,但因其“报销后的生育津贴高于其产假期间工资标准”,要求支付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差额的请求被驳回。

周思思告诉记者,“裁决秉公心,女工权益争议审理难,不仅难在女工权益保障,也难在‘一碗水端平’。客观上说,有时候用人单位也有一定难处。”但无论怎么样,裁决都不能被感情因素影响,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理念,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让更多企业和女职工了解相关法律,女工庭与区总工会联合举办案例讲堂,与辖区街道联合举办培训活动,向参会企业和女职工宣讲权益保护相关知识。“流动仲裁庭”在辖区街道公开审理“三期”女职工诉争案件,由街道组织劳动者与企业旁听,庭审结束后,主持庭审的仲裁员还会现场给企业和职工答疑解惑,向企业提供实用建议。



福利院里的“天使妈妈”

广东茂名市社会福利中心工作人员曾传莹(中)在给孩子上手语课(4月27日摄)。

广东茂名市社会福利中心现有服务对象806人,其中孤残儿童282名,是一个集养、治、教、娱乐、康复、特殊教育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省一级福利事业单位,也是全国脑瘫儿童康复训练示范基地。这里90%的职工是女性,多年来,在福利中心主任李兰的带领下,本着“悦纳孩子给予生命尊严”的精神,甘于奉献,是孩子们眼中的“天使妈妈”。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G 民声

入职体检结果

互认值得推广

舒年

又到毕业季,不少毕业生不只奔波在笔试面试的路上,也奔波在去医院的路上,因为许多单位都要求体检,但体检结果并不互认。求职者即便最后成了“分母”,血还是要先抽的,胸透也是不得不做了好几次,于是,有了“工作还没谈成,却先抽了好多管血”的吐槽,有的用人单位甚至“先体检后面试”,求职者还没进公司大楼,先要空腹去医院转一上午。当然,由于缺乏规范,个别用人单位要求的体检项目也是任意增减,“明明是应聘业务员,体检却像要当飞行员”。

对此,今年,北京市人社局、教委、卫健委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提出“取消重复体检”,不仅各高校取消毕业体检,该市用人单位常规入职体检也须在该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登记开展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进行,项目也以建议项目为主。“体检结果有效期6个月,有效期内体检结果互认,不得要求毕业生重复体检”,更为关键的是,这份通知“其他劳动者参照执行”,惠及的不只是应届毕业生,也囊括了社会招聘人员。

重复体检给求职者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用人单位指定的医疗机构不同,求职者不得不奔波于不同医疗机构重复着同样的检查项目。这不仅浪费时间精力,对身体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医学影像检查是按需要而做,而不是做的越多就越好,早上空腹的天数同理。更何况,有的用人单位要求求职者自费体检,未入职者不予报销,这更增加了求职者的负担。

笔者有位好友,属于爱尔综合征人群,这一人群占比其实不少,大概有3%~4%,表现就是晕血。晕血可不是一种简单的害怕,而是这一群体的血管迷走神经反应过于活跃,是一种进化的恐惧反射,能够减缓心率,降低血压,导致血液流向腿部,导致脑部血氧不足甚至晕倒。对于他来说,重复的体检已经是一种身心折磨,苍白的面色,每次也能让护士紧张许久。

事实上,这样的重复检查,也是对公共医疗资源的浪费,因为重复体检一样要占用和消耗医疗机构的人员、设备和耗材等宝贵资源,要知道,许多医用材料是一次性使用的。另外,在当下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毕业生重复体检也容易造成医疗机构人员聚集,并不利于疫情防控。

正因如此,这项措施值得在更多地方推广。当然,各地登记开展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不同,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可以实现互认,不同体检项目的有效期是多久合适,是否可以使用数字化体检档案方便求职者随时调用,都是值得继续探索的。

了基础,其中有的在全国推广应用。

64名民工牺牲在工地上

“修渠的时候,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最小的才14岁,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妇女。她们和男工一样,每天在戈壁滩上背石头。”阿西木·肉孜感叹道,60年过去了,很多参加过战斗渠劳动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

在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的一面墙上,记录着那些不朽的名字和英雄事迹。

1963年冬天,固拉合玛乡年仅22岁的买吐逊背石头时不慎在冰面上滑倒,背上的石块重重地砸到头部……1987年9月26日,人们正在引洪冲沙,不料沙丘突然崩塌,四人瞬间被掩埋到沙堆里,其中两名牺牲。

64位民工先后牺牲在战斗渠工地上,其中有17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69位英模,他们有的是干部,有的是农民。其中战斗渠管理站的艾沙一家三代都在战斗渠工地上出过力、流过汗。他在战斗渠建设工地上恋爱,在工地上结婚,在工地上生子。6个儿子有两个出生在战斗渠工地上,两个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从事水利工作。连续参加10年战斗渠建设的卡斯水·阿西木修渠返回后,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4年了……

1990年9月7日,策勒县隆重举行通车仪式。耗时30年的战斗渠建成通车,全县3000多名各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庆祝这一时刻。

现在,在策勒县,每逢节庆活动,总会有一款名为“战斗渠”的矿泉水放在宾客面前。这个曾经因缺水在历史上3易县址的地方,现在不但有了安全、干净的水源,还做起了“水经济”的文章。



900公里的守护

4月27日,巡线队员张伟伟(左)、张浩军在巡线途中。

顶烈日、迎风沙、每日徒步穿行山谿河道间……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的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长气田采气二厂,有一支120人组成的专业巡线队,肩负着辖区内900公里天然气运输管线的日常巡查任务。延长气田采气二厂出产的天然气主要用于保障陕北革命老区的工业、生活用气,同时也是西气东输管网的组成部分。因建设需要,该厂辖区内的绝大部分天然气运输管线远离公路,个别管线深处无人区,巡线队员必须携带设备与食品,每日徒步巡查。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新疆策勒县年降水量仅35.5毫米,蒸发量高达2955毫米,世代为水所困

三代人奋战30年的一条渠

本报记者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牛斌

南枕昆仑山皑皑白雪,北踏塔克拉玛干浩瀚大漠,新疆策勒县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降水量仅35.5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农作物全靠冰雪融水灌溉。

因为缺水,策勒县历来是“沙进人退”、“风吹城跑”。在策勒的历史上,县城有过3次迫不得已的搬迁。上世纪60年代起,策勒县跨越30年,历经三代人,在茫茫戈壁中打通了一条绿洲大动脉——战斗渠,将沉睡千年的荒漠变为绿洲热土。

一天三缸子水三个馕

在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里,摆放着磨秃了的十字镐、残缺的坎土曼、变形的铁锹,以及背石头的木架子等。上世纪60年代,各族群众就是用这些工具,从昆仑山脚下的奴尔乡博朗台村向达玛沟乡托克玛村修建了全长86.3公里战斗渠,将奴尔河水引入平原乡镇。

为了修渠,策勒县先后11次组织大会战,最多时一次动用1.2万人。战斗渠754万立方米土方量,基本上是靠当地农民用坎土

曼和十字镐挖出来的;砌筑渠道的58.8万立方米石块,也是农民弯腰驼背、一步一步从戈壁滩背回来的。

原策勒县水利局副局长阿西木·肉孜的青春记忆都留在了这里。1960年3月,战斗渠开工,他是测量队唯一的技术员,每次外出测量时间短则七八天,长则十来天。测量仪器、食物、水和行李都放在骆驼背上,测量队员只能步行。

没有地图和经纬仪,也没有可参照的水文资料,阿西木·肉孜和队友只能根据奴尔河历年洪水留下的印迹,沿着河床逐段用石块、红柳枝、芦苇做标志,给即将修建的战斗渠定位、放线。近百公里的河段,他们就是这么一步步反复测量了5次,最终确定了一条既短又直的渠线。

“水利工地缺水缺食物,每人一天只有三缸子水、三个馕,饭都是用脏水做的。”阿西木·肉孜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住的是地窝子,冬天露宿在戈壁上,寒风难挡。有些人合铺相互用体温取暖,有寒人点起了篝火,烤火过上半夜,下半夜就睡在烧热的土地上。还有的农民挖个沙坑把自己埋进去,靠白天太阳留在沙子里的余温抵御夜间的寒冷。”